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金以林
马思宇
编

吴稚晖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金以林
马思宇
编

吴稚晖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吴稚晖卷/金以林, 马思宇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300-20356-0

I. ①中… II. ①金…②马…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吴稚晖 (1865~1953)-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2453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吴稚晖卷

金以林 马思宇 编

Wu Zhihui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印 张 26.5 插页 2

字 数 426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径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前清举人、维新小卒、革命斗士、“反共先锋”、无政府主义旗手、三民主义拥趸者，当如此繁多的标签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时，当这个人以如此复杂的身份涉入政治的迷局时，注定了此人身份莫辨、毁誉参半的历史评价。吴稚晖就是这样一个人。

吴稚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过多重角色：他很早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国民党内颇具威望的元老；又参与了相当多的历史事件，诸如《苏报》案、海外中国大学的创立、反共政变的发轫、国语运动的推广等等；他还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教育、文化诸多领域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 民国元老跌宕人生

吴稚晖，名朥，后名敬恒，字稚晖，1865年3月25日出生于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雪堰桥一户普通商人之家。吴稚晖成长经历曲折坎坷，幼年丧母，由其外祖母收养，直至成年，“其恩至笃”。

吴稚晖在旧式私塾中，辗转完成其基础教育，先后读完了“四书”、《易》、《诗经》、《礼记》、《古文观止》等。家境的贫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五六岁时，处境骤窘，常有断炊之虞。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这不仅令其提前结束了学习生涯，同时也对其世界观不无影响。吴稚晖一生看重物质世界多于精神世界，鼓吹物质不可须臾而缺。

学途中辍，并不能令其灰心。吴稚晖22岁考入县学，两年后进入著名的江阴南菁书院。26岁，乡试中举。次年，入北京会试，试后仍

就读于南菁书院。一日，江阴知县过孔庙而未下轿，吴稚晖的同学田其田等人深以为不恭，遂拦轿质询，举石击轿。知县大怒，将田其田押入县署，后经书院山长黄以周交涉，知县承认拘捕举人不当，当场向前来质询的吴稚晖等人承认错误，并令随从礼送回书院。

一日，新任学政在画舫请客喝酒，吴稚晖听闻此事，愤其有辱斯文，决定和同学一道捉弄学政。他们二人身着四开箭裤袖袍，头插松枝萝卜，手持草纸，跑到学政面前，请求赐酒三杯，随即四脚朝天，大出洋相，弄得学政十分狼狈。书院山长认为吴稚晖难以管束，令其离院，吴稚晖随即进入苏州紫阳书院肄业。

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于中国士人的思想世界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像吴稚晖这样的一批读书人，开始倾向革命。吴稚晖曾回忆，“在甲午以前，一懵不知革命焉何物，但慕咬文嚼字之陋儒。经甲午惨败，始觉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学了西方工艺，才能造大炮机关枪，抵抗敌人，所谓‘兴学之刻不容缓’，开始冒充为维新派小卒。以后受了许多刺激，才一步步的‘浪漫’起来，直到癸卯（1903年，引者注）正月，在上海张园演说，演高兴了，才开始称说革命”。

1895年至1903年，是吴稚晖由成年（30岁）向壮年（38岁）的成长转型时期，也代表了一批读书人寻觅救亡之路的心路历程。吴稚晖参与了公车上书，又拜会了康有为，继续申说其不作八股、反对缠小脚、拒绝吸鸦片的主张，得到了康有为的赞许。

吴稚晖写过三千字的折子，劝光绪皇帝革新变法。戊戌年元旦之际，吴稚晖将左都御史瞿鸿禨的轿子拦下。瞿见是一个衣冠整齐的青年，便命轿夫停轿。他看了折子后，说：“唉，时局到了如此，自然应该说话，但你的折子，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我带回去细看再说，你后面写有地址，我有话，可通知你。你们认真从事学问，也是要紧的。”^①

如果说热心变法、参与维新是吴稚晖革命的第一阶段，那么他流亡海外的经历应该称得上革命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为他的革命生涯奠定了组织基础，同时也确立了他的思想基础。

1901年3月，吴稚晖坐上了由上海开往日本东京的邮轮，加入了甲午之后的中国学生留日浪潮。当时，与孙中山相善的吴禄贞、程家桢

^① 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见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16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

邀请钮永建看望孙中山，钮邀吴稚晖同去，遭到吴的拒绝。据吴稚晖回忆，他此时还在维新的阶段，一时难以接受孙中山的革命观：“我的心中，就不当他是绿林豪杰，以为他确要成为洪秀全第二。但其时我虽然也进了一步，从温和的我终还是忘不了要扶持光绪皇帝。觉得那种反叛的事业，做呢未尝不可做，终为像不正当。常想让孙文去做罢，我是不做。”^①

但与革命党人的交游，以及留日学生中变革舆论的熏染，毕竟让吴稚晖有所感悟，这才有了成城事件中的吴稚晖。成城学校是带有军事色彩的中学，是中国学生来日投考陆军补充士官生的重要渠道。1902年，九名中国自费留学生请吴稚晖向中国驻日公使求情，要求进入该校学习，遭到公使拒绝。吴稚晖气愤难当，到大使馆与公使对峙，却被公使以“妨害治安”的罪名遣送回国。吴稚晖怀绝命书，愤而投水，为警察所救。绝命书内容如下：“信之已死，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健邦天则。削发维新，片言可决，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唏嘘悲哉。公使何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言语之间，虽仍有忠君爱国之思想，但已显革命决绝之态势。吴稚晖回国后，便常在上海张园演讲，并在《苏报》刊文，“鼓吹罢学，与夹带革命，双方并进”。

1903年，因《苏报》案起，吴稚晖被迫流亡英国。他在英国见到了孙中山、张静江、李石曾，决心投身革命。1905年，吴稚晖在伦敦加入同盟会。而后，吴稚晖等人于巴黎组织世界社，发行《新世纪》，每周一期，并组设中华印字局，“专倡无政府主义，奇谈异说，震惊一世，我国人之言无政府主义者自兹始”^②。

在20世纪20年代初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吴稚晖被胡适誉为科学派的“押镇大将”，“中国近三百年来四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③。晚年吴稚晖则逐步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政客，不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出谋划策，同时也成为蒋介石独裁道路上的理论诠释者。

① 吴稚晖：《我亦讲中山先生》，见《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6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② 冯自由：《新世纪主人张静江》，见《革命逸史》第2集，2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③ 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见《胡适文存》第3集，53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4。

抗日战争爆发后，72岁的吴稚晖痛斥汪精卫叛国投敌，写下了“倭奴休猖獗，异日上东京”^①的慷慨诗作。吴稚晖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蒋介石“每遇党国有疑难大事，总是先就教于先生，并以其一言而决”，就连孙中山也“尊之如师”，吴稚晖党内地位可见一斑。

1949年，84岁高龄的吴稚晖随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1951年，他编撰完成《郑成功史表》，两年后在台北病逝。按其生前遗愿，蒋经国等人携带吴稚晖的骨灰，乘军机抵金门，换乘民船至大小金门之间的海面，将骨灰撒入大海。在其生命终结之时，仍心系国家统一。

二 无政府主义“第一人”

吴稚晖不仅在政治上声名显赫，而且在思想方面也独树一帜。他不仅是近代提倡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②，同时也经历了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由盛转衰的全部过程。通过对他的思想研究，我们得以一窥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吴稚晖6岁发蒙，历十四载苦读诗书，久在儒家大同思想中浸淫。在其诸多无政府主义思想著作中，都能看到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向往之情。吴稚晖在法国之时，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横行之际。他阅读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书籍和报刊，并同法国著名无政府主义大师格拉弗有密切往来，深受英法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此外，在吴稚晖的思想中，还可以看到佛家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痕迹。

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一个包含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宗教观、文化观的相对复杂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几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并与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时局发展产生呼应，令国人耳目一新，启发了不少青年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

吴稚晖的宇宙观是“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何谓“漆黑一团”？不可思议、不可言明是也。^③然不可言明之外，吴稚晖认为，宇宙本出于“一个”。在所谓“一个”的本体论认识下，吴稚晖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

① 储福兴：《吴稚晖先生轶闻》，载《江苏文献》，（台湾）第19期。

② 刘师复：《晦鸣录》第2期，1913年8月27日。

③ 参见吴稚晖：《宇宙不悖论》，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一），106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

释，即“并无物质之外的精神，精神不过从物质凑合而生”，并进一步解释，“一个”乃有质有力的活物，“质力者，一物而异名”。万物皆由质素构成，“质力相应”产生“感觉”，因而万物皆活。^①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判断出，吴稚晖努力吸收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以贯彻其唯物观念，虽有机械论之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是明显进步。

吴稚晖不但认为万物皆活，同时还提出万物各有责任、各司其职，其职曰“共造宇宙”。由此引申出“改良又改良”，乃“原始的天理契约”。天理契约内在要求人性皆善。凡是作恶之人，乃是不及善也。宇宙本身“欲得一好看的现象而后生出者也”，“世界本善”，“人性亦本善”，“不为善，即不必有人”^②。

吴稚晖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是向善，而另一个基本看法是要创造，“上帝是大造物，人是二造物”，不仅要创造，还要“造多一些，要造到无可造，要造到什么东西都有”，这是人的“天职”^③。

推己及人，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吴稚晖发展出互助的理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存我与存他并重，如是而已，即宇宙之大律”，“言乎互助，固一义也”。他指出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竞争之势日烈”，“天然之淘汰，与人为之淘汰，相辅而行”，“国之弱、种之愚者，直不能自立于世界”。吴稚晖开出的药方，是施以道德，一曰无我，一曰博爱。有我则“生有领受苦乐形色名号诸想，迷误愈深，又生利害善恶胜败诸想”，而无我则无胜败之想，于是乎争端遂息。而博爱则是为了互相救助，达到人人平等的最高境界。^④

吴稚晖在提出其“一个”的宇宙观时，着重强调了这里的“一个”并不包含神鬼，这揭示了他的反宗教观念。在吴稚晖看来，宗教在塑造人格、进化道德方面，可称宗教主义，适与社会主义并论而互斥。相较于“全涵‘无我’、‘博爱’等道德之社会主义”，“稍涵‘无我’、‘博爱’等道德之宗教主义”就显得落后和无用。吴稚晖认为：“既讲社会主义，即有社会主义之道德，可成社会主义之人格。道德乎，取诸社会主义而已足；人格乎，得之社会主义之道德而较良。如是，则宗教有何

① 参见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世界观》，见梁冰弦编：《吴稚晖学术论著》，出版合作社，1925。

② 吴稚晖：《世界有四》，载《世界半月刊》，1946年，第一卷第四期。

③ 吴稚晖：《我的人生观》，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一），106页。

④ 参见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载《新世纪》，第37号。

余地足以自存而可免于反对?”吴稚晖还驳斥了当时社会流行的宗教利于教化的观点。他以法国为例,指出法国不信宗教者比比皆是,而教化不失,盖因“宗教者,偏于人与神感通之迷信;教化者,偏于人与人相互之道德”,两者不可同日而语。^①

吴稚晖认为:“一种族之盛衰兴灭,恒与其迷信之浅深为比例。”为了证明这点,他还举了几个史例:“回教大兴,天方不振;儒宗定一,五胡乱华;基督漫衍,突厥蹂躏欧洲;释迦降生,印度国即微弱”,综上所述,宗教迷信不仅阻碍社会进步,更会延滞革命的到来,“恐惧迷信,世界强权之所基也。基以迷信、助以恐惧者,宗教是也。基以恐惧、助以迷信,政府是也。所倚有重轻,斯改革有难易,故宗教之革命难而政治之革命易,政教分立之国之政治革命易而政教混合之国之政治革命难”。而现在的情况正是“支那者,政教混合之国也,亦恐惧,亦迷信”,所以吴稚晖提出:“破世界人之迷信,世界人之所有事也。支那人者,世界人之分子也,破支那人之迷信,即破世界人之迷信,吾辈支那人请行孔丘之革命,以破支那人之迷信。”^②

“行孔丘之革命”,联系到吴稚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一方面,吴稚晖视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为无政府主义的仇敌,痛恨“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封建宗法社会以君天为名造君权神授,以法父为由造三纲五常,四者盘根错节,互相援引,遂铁铸公认为社会成立决不可无之要素。而且“孔、孟、老、墨”这些所谓的“国粹”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不符合抵抗强敌的国情,因此若要铲除封建宗法社会,打倒专政强权政府,就不能不“行孔丘之革命”,“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③,方能行无政府主义之大道。吴稚晖宣言反孔孟学说,有其策略性的因素在其中,用他的话说就是“矫枉过正”的方法。

但另一方面,吴稚晖亲近孔子的思想面相,在晚年逐渐凸显。他不但坦言“我们到了现在,还数不出另有一人,过于孔子”^④,而且借由儒家大同学说以阐发三民主义。^⑤从这一角度观察,吴稚晖的思想轨迹表现出一种向传统的回归。

① 参见吴稚晖:《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见《吴稚晖学术论著》,198、200页。

② 吴稚晖:《排孔征言》,载《新世纪》,第52号。

③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见秦同培编:《吴稚晖言论集》,101~108页,中央图书局,1927。

④ 吴稚晖:《生民以来未有孔子》,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八),1145页。

⑤ 参见吴稚晖:《孔子大同学说》,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一),217~221页。

吴稚晖对于大同社会的想象，体现了当时社会主义者的一种普遍想象。吴稚晖坚称这并不是乌托邦的理想，因为“凡有今时机器精良之国，差不多有几分已经实现，这明明白白是机器的效力”^①。具体而言，大同社会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凡可以造宇舍，供吾人住居之处，必使全世界处处相接”，“一切都会、省府、村町之名词”全部废止，“一切壮丽之宫室、宏大之寺庙”一一拆除，“所有一切宇舍，皆建一层楼，或建平房，位置于前花后木之间。其高大登眺之建筑，皆在园林”。交通便利，海底气界自由往来，“精究卫生与医理，使年寿加增”，“文字简易划一”，科学技术“易知而易解”^②。

吴稚晖反对私产，主张各取所需的直接分配制度。同时他反对商业，称商业为社会主义之仇敌。但在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问题上，吴稚晖的回应颇为暧昧：一方面，他称“占据机器的富人”为“我劳动人的魔鬼”，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无产阶级行动起来，会“无工可食”。他质疑无产阶级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智慧，“止有劳动的精力，没有机器的智识，一到抵抗之时，但能‘毁器’、‘加薪’，便结不起‘劳动组合’”^③。这又显示出他面对社会实际问题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

政治思想方面，无政府主义成为吴稚晖宣传排满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排满革命为表，无政府主义革命为里，表里相应，革命互通。

吴稚晖抨击清统治者为“清贼”，呼吁“毁灭君主之痕迹”，以“宣畅人民之自由”；吴稚晖早年宣传排满革命的文字极尽插科打诨、讥讽揶揄之能事，讽刺满人为“长尾胡”、“大盗”、“妖孽”，不一而足，折射出当时排满革命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但吴稚晖在狭隘民族主义之外，还提出“排满革命，非种族上之问题，乃革命条件上之事类也”，首重唯在废除帝制，“时代已入于二十世纪，所有一切皇皇帝帝，皆当先后灭绝，此世界公理家之公认也”^④。

清廷立宪议起，吴稚晖提醒国人，不要为立宪派蒙蔽双眼，如此之立宪必阻碍革命，宝贵的革命机会“其势必为预备立宪之诈术所消失”^⑤。

① 吴稚晖：《机器促进大同说》，载《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2号，77、78页。

② 吴稚晖：《谈无政府之闲天》，载《新世纪》，第49号。

③ 吴稚晖：《机器促进大同说》，载《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2号，77、78页。

④ 吴稚晖：《皇帝》，见《吴稚晖学术论著》，406页。

⑤ 吴稚晖：《奴才管见》，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1362页。

他还批评汉族官僚助纣为虐，欲假立宪而保皇族，实系“置中国之前途于不问”，丝毫没有体恤广大汉人“浮沉于欲进步不能进步之地位”^①。

吴稚晖的革命思想不止于此，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远远超出一国政治革命的范畴。吴稚晖将目光投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范围，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称“帝国主义即强盗主义”，“帝国主义兴，而后世界无公理、无人道、无良心”，“不行全世界之大同革命，世界终不能正当也”^②。吴稚晖更是将帝国主义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主张相联系，称保皇党人“今日曰兴警察，明日曰征民兵，后日曰君统万世。其举动虽卑鄙可耻，实则怀帝国主义之野心，而欲效西施之颦也”。吴稚晖警告青年勿受保皇党蛊惑，倡言“二十世纪之天地，即大盗帝王性命结果之日。帝国主义扩张之国，转瞬将为陈迹，不复再现矣”，因此望中国青年“多学科学，多造炸弹，各尽天良，以逐胡狗，使帝国主义勿萌芽于中国”^③。

吴稚晖所展望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其根本目标系打倒世界帝国主义，直接目标为打倒清政府，而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直接存在的内在关联，正是吴稚晖力图阐发的，如此一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可以互相援引、互相支撑。

吴稚晖还将无政府主义革命与政治革命相区隔，指出政治革命“以抗争权利为目的”，会招致“丧其民之公德心”的恶果。而无政府主义革命恰恰相反，其以“唤起人民之公德心”为目的，力图通过“舍弃一切权利”，而“谋共同之幸乐”。但无政府主义与常人所理解之革命相远，而与教育相近。所以吴稚晖大力鼓吹教育，称“无政府主义之革命，无所谓提倡革命，即教育而已”。教育并非革命之手段，教育本身就是革命。而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真理、公道所包之道德，如共同、博爱、平等、自由，以及真理、公道所包之智识，如实验科学。^④可见，吴稚晖虽然指出清政府为“民权伸张”之障碍^⑤，不得不首倡排满革命，但政治革命只能为无政府主义革命之前提，而非最终目标。

① 吴稚晖：《臭皮囊蜕化》，见《吴稚晖学术论著》，416页。

② 吴稚晖：《混蛋世界》，见《吴稚晖学术论著三编》，24页，出版合作社，1927。

③ 吴稚晖：《帝国主义之结果》，载《新世纪》，第3号。

④ 参见吴稚晖：《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载《新世纪》，第65号。

⑤ 参见吴稚晖：《革命商》，载《新世纪》，第65号。